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31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荒原和爱情

〔瑞典〕埃里克·卡尔费尔德

（193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陈文荣等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荒原和爱情

〔瑞典〕埃里克·卡尔费尔德

(193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陈文荣等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荒 原 和 爱 情

[瑞典] 卡尔费尔德

(1931年获奖)

陈文荣 王 磊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6 字数 295,000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含精装 1294 册)

ISBN 7-5407-0866-1/I·609

定价: 平 装 8.70 元
彩盒精装 15.20 元



[瑞典] 埃里克·卡尔费尔德 (1864年——1931)
(193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辐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又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贵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据。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國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龄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 译本前言 ·

唯一死后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石琴娥

诺贝尔文学奖只颁发给活着的作家。近九十年来唯一的例外是瑞典诗人卡尔·费尔德。他生前曾多次被提名授奖，都被他以本人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等理由推辞不受，直到他去世后半年才成为这项国际大奖的光荣得主。

卡尔·费尔德之所以能以破例的方式获此殊荣，当然决非偶然。这位大诗人的名字，尽管我国当代读者知之不多，而早在七十年前，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就热情地作过介绍。他在1922年3月号《小说月报》上撰文给予卡尔·费尔德的诗作以好评，称扬他的诗歌“虽未能称为完全无疵，但生动活泼而清新”。茅盾先生认为，卡尔·费尔德受弗洛亭^①影响很大，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卡尔·费尔德的严谨笔法更胜于弗洛亭的亢奋”。茅盾先生在文中还写道，“瑞典现代两大诗人，各人代表了一个方面。海顿

^① 弗洛亭·古斯塔夫(1860—1911)，瑞典诗人。

斯坦^①是知识阶级的贵族的，而卡尔费尔德是农民的。瑞典有了这两大诗人真堪自骄”。

卡尔费尔德的同胞、瑞典学院院士安德斯·奥斯特林^②在1931年颁发诺贝尔奖金的庆典上说，因为卡尔费尔德“表现出了我们所敬慕自珍的独特风格和豪爽坦诚的性格，因为他以千钧之力和细腻入微的特殊魅力来引吭讴歌我国人民的传统，放声高唱那如潮松涛、那峻岭高山，正是这些可贵的山湖风光成为我们热爱家园和国家的感情基础”。接着，奥斯特林对卡尔费尔德的诗歌作了他认为难以评价的评价：“如今他的作品已成为一项伟大的国际奖金的对象，不过，当我们试图将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的毕生事业作一简要概述时，我们面临同样的困难。正是抒情诗歌深思熟虑的自我封闭（大凡抒情诗都注定有此命运），使作品的最深远博大的神韵和宝贵价值无不水乳相融地同它本身的母语的特征和韵律紧紧相连，甚至每个字眼的含义和分量都是如此。卡尔费尔德独树一帜的特色经过翻译便会变得朦胧晦暗，可能难于感觉出来，只有在瑞典语中才能让人充分领略体会得到。然而，如果有人试图单独地比较它们的价值的话，他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同那些所谓的大国的文学作品相比，卡尔费尔德用一个所谓的小国语言创造出来的珠宝也毫无逊色之处，反而同它们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① 海顿斯坦，卡尔·古斯塔夫·魏尔纳·冯(1859—1940)，瑞典诗人，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奥斯特林，安德斯(1884—1981)，瑞典诗人，1919年起任瑞典学院院士，1941年至1964年出任该院常任秘书。

从19世纪70年代起,瑞典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资产阶级日趋强大,乡村中原有的按照古老家庭关系建立起来的庄园、作坊和村庄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经营方式。农村中固有的宁静没有了,古老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也被打破了。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Erik Axel Karlfeldt, 1864—1931),就是在瑞典这样的社会大变革中诞生和成长的。他于1864年7月20日出生在瑞典中部达拉那省的福尔克谢那的一个农民家庭。祖辈都是农家,父亲拥有一座托夫曼农庄。童年时代家境十分富裕,生活愉快幸福。随着瑞典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大批的庄园主、农庄主不断破产,卡尔费尔德的父亲也受到冲击,家境日趋衰落。卡尔费尔德是一个乐观豁达、沉默寡言、腼腆怯生的人。早在中学时代即崭露才华,19岁起发表了一些很优美的诗作。1885年,他赴乌普萨拉大学求学。正当前途似锦的时候,父亲由于经济亏空而不得不把庄园拍卖掉。这使得他在大学期间生活十分拮据,曾几度辍学,不得不去教书,但他意志坚强,终于在十几年后取得了两个学位。整个这段期间,他始终不屈不挠地对付逆境,孜孜不倦地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的一生要几经奋斗才能达到个人的人格和谐,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1895年,卡尔费尔德发表了处女作——抒情诗集《荒原和爱情之歌》,引起瑞典诗坛轰动,奠定了他成为瑞典一代伟大诗人的基础。1898年,他发表第二部诗集《弗里多林之歌》。在这

部诗集里，他竭力摹仿瑞典大诗人贝尔曼(1740—1795)和芬兰诗圣鲁恩贝格(1804—1877)的表现手法。贝尔曼创造了弗雷德曼、鲁恩贝格创造了芬立克·斯多尔，作为他们各自的长篇叙事诗的主人公。卡尔费尔德也塑造出了一个既是学者又是农民的弗里多林形象作为他这部诗集和以后诗集的主人公。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学问，进行创作，卡尔费尔德放弃教席，于1900年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找了一个职务。几年后在农业学院的图书馆担任馆员。1901年，又一部以弗里多林为主人公的诗集《弗里多林的乐园》问世。这些诗作为他赢得空前盛名，受到瑞典各阶层的青睐，各种荣誉头衔接踵而来。1902年，他当选为瑞典皇家农业学院院士。1904年，被选为瑞典学院院士。1912年起，又担任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1916年获瑞典文学大奖，1917年获荣誉哲学博士。

继“弗里多林”诗集之后，卡尔费尔德又连续发表了许多享有盛誉的诗集，如《弗洛拉和波玛娜》(1906)、《弗洛拉和贝洛娜》(1918)和《秋日的号角》(1927)等。

自1918年起，瑞典学院有好几次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卡尔费尔德，但他再三推辞，其理由是自己不但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机构瑞典学院的院士兼常任秘书，而且还是瑞典学院里负责审查有无得奖资格的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不宜领奖。其他院士们一方面对卡尔费尔德的谦虚谨慎十分敬佩，另一方面认为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

1930年，卡尔费尔德重病缠身，向其他院士们表示不想再继续担任学院的常任秘书——他已经担任此职将近20年之久了。但那年的12月10日，卡尔费尔德仍以原来的身份带病主持了又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并在典礼上为美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路易斯发表了精彩、热情而风趣的

授奖词。

1930年下半年，瑞典学院按照惯例向瑞典及世界各地的著名人士发出函件，请他们提出下届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截至1931年1月，瑞典学院收到的推荐名单约有30余人，其中有英国的约翰·高尔斯华绥、瑞士的赫尔曼·黑塞以及希腊的帕拉玛斯等。卡尔费尔德再度被提为候选人，是由瑞典极有影响的人物——乌普萨拉大主教、瑞典学院院士那·舍德勃罗姆(1866—1931)提出的。实际上，自卡尔费尔德要求不再当常任秘书起，瑞典学院的其他院士们又在考虑把1931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他们认为从那时候起，卡尔费尔德不应该再有任何顾虑，也不应该再反对其他院士们的一致决议了。

1931年元旦过后不久，卡尔费尔德的身体更为虚弱。3个月后，即4月8日，卡尔费尔德不幸在首都与世长辞。1931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授给何人成为瑞典学院的一个棘手问题。经过再三斟酌，瑞典学院还是决定把该年度的文学奖授给卡尔费尔德，以表彰他的诗作，并于10月8日向公众宣布。瑞典学院认为，诺贝尔奖的规章明白允许颁奖给业已去世的人，只要对这个人的推荐信是在他去世之前提出的。卡尔费尔德的情况倒是确实如此。但是，类似的先例从来没有过，在此之后，几十年间也再没有人死后获奖。因此，卡尔费尔德作为唯一的例外，一直格外引人注目。

二

卡尔费尔德是19世纪90年代瑞典文坛上重要的抒情诗